

天津河北文史

張餘
題

第 二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目 录

照片插页

张友渔同志在天津……………钟和高 (1)

直 沽 话 旧	李鸿章及天津李公祠……………王者师 (13)
	饮冰室与护国战争……………杨武进 葛培林 (18)
	长芦育婴堂始末……………尹树鹏 (24)
	天津最大的毁人炉——回力球场……………杨恩骏 (32)
	耳闻史话……………尹树鹏 (38)
	曹氏家族及其在天津河北的产业……………杨武进 (43)
革 命 摇 篮	觉悟社·《觉悟》……………张经文 (48)
	邓颖超同志视察觉悟社旧址陈列馆……………章 理 (56)
	“五四”运动时期邓颖超在津二三事……………毛金道 (59)
	邓颖超与女星社……………张经文 (61)
	忆天津的一次追悼鲁迅活动……………双 火 (66)
文 教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夏明远 (68)
	忆觉民中学……………时彦文 (72)
卫 生	昔日扶轮中学 今日铁路一中…铁一中校史办公室 (75)
	天津国学研究社略介……………张淑纯 (81)
史 话	忆母校“市师”在河北……………戴文祥 (85)
	从“法政”到“法商”……………张绍祖 (92)

工 商 史 料	天津达仁堂七十五年.....季世华 (99)
	川鲁饭店今昔谈.....孙 煌 (109)
	从东天仙到民主剧场.....白崇厚 (118)
	“奥国菜市”旧迹忆述.....刘炎臣 (120)
	“转盘”和“津浦大厂”.....苏 朋 (124)
人 物 志	焦佑瀛佚事.....许杏林 (131)
	辛亥烈士王钟声.....王念敏 (136)
过 眼 录	“河北”半个世纪以来天津的政治中心.....汪桂年 (138)
	《七·七事变与天津军民奋起抗战》补遗...郑 平 (142)
	从“河北”看天津交通的发展.....岳 丹 (145)
	忆中国人首次驾飞机来天津.....汪桂年 (150)
画 友 录	刘子久小传.....王振德 (152)
	李智超小传.....王振德 (154)
	冯星伯.....于海天 (156)
坊 巷 采 风	白马庙前话孤云.....王者师 (158)
	“河北”地名杂谈.....王翁如 (163)
	刘春霖与状元楼.....基 汉 (168)
	李桂春与达子楼.....严 忱 (171)
	天津刘道原佚事.....刘炎臣 (174)
补 白	小资料 (17) (173)
	诗 (12) (17) (23) (58) (60)
	(67) (123) (135) (162)
	印 拓 (47) (74)

张友渔同志在天津

钟 和 高

[编者按]: 本文经张友渔同志审阅, 谨致谢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法学专家、九旬老人张友渔同志, 对我国法制建设, 大力擘画, 功绩卓著, 受到国人的崇敬。张友渔同志早年参加革命, “五四”后从家乡山西到北京上大学, 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到京津从事革命活动。从1928年国民党北伐到天津之前, 直到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 东北军入关, 张友渔同志曾在天津工作。其间, 尤其出色的是利用天津市政府第三科科长的公开身份, 为党的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原天津市政府先设在现河北区进步道平安街口东侧的一所大楼(原为王占元所建, 前曾作为武警医院, 现正拆建), 后迁到河北大经路(今中山路)金钢桥口原省公署即现在的金钢花园及市立第二医院旧址。张友渔同志当年在津的活动, 也就是以“河北”地带作中心。我们就所见所闻, 记述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 这正是《天津河北文史》第二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到天津从事“新闻工作”

张友渔同志到天津, 是在1928年国民党北伐向京津进发的时期, 由党的顺直委员会派到天津进行统战、情报和掩护、营救共产党员的工作。当时和友渔同志一道进行革命工作的有胡照庵(当时公开身份是天津造币总厂的总务科长)和李愚庵(李遇安, 后名李子昂, 公开身份是天津市公安局预审科主任科员)两同志。友渔同志

当时在陆少游的京津通讯社工作。通讯社是对报社(兼及机关、团体、企业)提供新闻消息的组织。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从事新闻事业,是所谓“自由职业”者,属私人组织(虽然有接受某方面“津贴”的,却少有公开的“机关报”)。二十年代末的天津新闻报纸,有《大公》、《益世》、《庸报》、《商报》、汉文《泰晤士报》、《华北新闻报》及《新天津报》等,其中以《大公》、《益世》两“大报”规模较大,设备较好,销路较多。那时各报设专人在外地采访的不多,只依赖通讯社供稿。《国闻通讯社》和管翼贤办的《时闻通讯社》每天发出国内外“要闻”,那是每天夜里十二时用快递赶“京奉”从北京寄到天津,报社按时派人到东站邮局去取。外国通讯社有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美联社》和日本的《同盟社》等,不过收费颇多,一般报社是不肯下大本钱的;于是赖“剪报”转载。日本人在天津有日文《京津日日新闻》,英国人有英文《华北明星》报。《日日新闻》在现在的和平路邮局旁,每天上、下午出早、夕刊两次。有的报社就从日本报纸上抄一些。但通晓日文的也不多,所以在翻译的准确性上也成问题。1928年国民党北伐,很快就进到长江、奉系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已难维持局面;在天津直鲁军的褚玉璞统治更是岌岌可危。人民群众都在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友渔同志就利用这时机,在京津通讯社翻译日文新闻报纸上有关北伐进军的消息,为天津报纸提供了可靠的新闻稿,鼓舞着并加强了天津各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志和信心。京津通讯社当时在天津声誉大振。虽然在褚玉璞横暴的干涉和压迫下,京津通讯社不敢再让友渔同志译稿发布,但友渔同志在天津新闻界中已受人重视和钦佩。那时天津中小型报纸,有《华北晚报》、《新天津晚报》或以敢作报道,或以连载小说,受到社会欢迎,销数频增。老报人熊少豪办了汉文《泰晤士(times)报》(馆址在今滨江道上),并计划发行晚报,于是特邀友渔同志任晚报总编辑。《泰晤士晚报》发行后,一时以发表军阀政府所不愿见报的消息著称,为社会各界所称道。像五月三日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竟在济南实行武装干涉,制造了惨案;国民党政府的山东交涉员蔡

公时遭难，津市人心震动：《泰晤士晚报》独家及时作了报道，激发了人民爱国的义愤。六月四日，张作霖见北京已难困守，于是乘专车回沈阳，准备率军撤回东北。途经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这消息日本报纸是不作真实报道的，只说是张作霖被炸，张友渔同志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了张作霖被炸消息，立刻编写了报道，在《泰晤士晚报》用显著的位置，大字标题，刊登出去，震动了天津。张友渔同志在天津从事新闻业务，进行党的统战工作。唤起群众保民族、爱祖国的热忱。《泰晤士晚报》以消息快速著称，张友渔同志也以才干出众受到新闻界的称赞。

二、打入天津市政府

国民党的北伐，是为了推翻北洋军阀最后一个奉系的政府，所以蒋介石和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山西)及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广西)系，获得了暂时的妥协，他们分任四个集团军的司令，向北京、天津进军。“五三”惨案发生后，济南被日本军队占据，北伐军从津浦线进军受阻，蒋、冯部队不得不从陇海、京汉铁道北进，耽误了时日，阎锡山于是得捷足先登向京津扩张。直鲁联军在山东已失败，褚玉璞在直隶(天津)已是难以立足，于是阎锡山和褚玉璞建立了默契，褚玉璞准备在“安全离去”时，把天津交给阎锡山在京津的秘密代表南桂馨。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因为形势的发展，不能不把京津划给晋系，由阎锡山任“平(北京改称北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晋军的军长)为河北省(直隶改称河北)省政府主席，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阎锡山并派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原为晋军先导，进军占领了涿县，被奉军包围，相持多日，最后傅作义从涿县间道来津，暂住在日租界：褚玉璞由于徐源泉部反正，仓卒离津，傅作义便首先接管了天津市的政权。

阎锡山有了平津河北的地盘，晋系势力大张，这自然会使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加剧。中共北方局军委特科认为要利用时机开展工作，便指示张友渔同志打进天津特别市政府，以便更有力地进行

统战、情报和掩护营救共产党员的工作。张友渔同志利用山西籍，同南桂馨有过接触的关系，经过一些活动，便到了天津特别市政府，任了宣传科长职。

“五四”运动时，张友渔同志在省里上学，原名张象鼎，是山西省学联负责人之一，当时和南桂馨有过接触交往。南桂馨作阎锡山驻京津的秘密代表时，曾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界)。为反北洋军阀，张友渔同志曾根据中央地下组织的指示，对南进行工作，和南联系过多次。南桂馨已认为张友渔是个年轻有为之士，对他倍加青睐。后来，张友渔同志在天津办报，南桂馨也来到天津。那时天津的报纸，有的是属于蒋介石的，有的和冯玉祥有关系。晋系为了在新闻方面扩大影响，加强在天津报界的力量，南桂馨决定接办汉文《泰晤士报》和晚报。同时他已知道《泰晤士晚报》的总编辑张友渔原来就是他所见过的张象鼎，他便决心借助张友渔同志在报界的地位开创新局面，并亲自去接办，表示郑重。他见到张友渔同志后，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紧紧地握手，连连说“久违，久违”，于是发表由友渔同志任《泰晤士报》总编辑。那时警备司令部刚刚成立，南桂馨便介绍张友渔同志到警备司令部给警备司令傅作义当秘书，不久又调友渔同志到市政府任宣传科长，掌全市宣传工作。天津市政府设立初始，处局机构尚待安排。友渔同志在当时初建的市政府里独当一面，突出地显露出组织领导的才能，受到信任，同时也给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南桂馨任天津市长不久便离去，接任的是山西人崔廷献。崔是旧知识分子，曾任山西省议会议长、河东道尹，思想比较开朗，喜研讨问题；他接任时带来的秘书长是冯司直(字振邦)。冯当时是中间偏左的人物，他们对张友渔同志的学识和能力颇为器重，时常和友渔同志交谈政治问题，很是投契。后来天津市政府调整组织，秘书处外设三科，张友渔同志任第三科科长，掌宣传、社会、文教和群众团体的工作。

张友渔同志在市政府任科长，开展工作，亲自抓新闻宣传，组织记者招待会，按日订时接见新闻记者发布新闻，解答问题。津市

各报的记者和外地的驻津记者都和张友渔同志熟识。张友渔同志主持的第三科，在市政府中是最活跃、最出色的部门，因此，张友渔同志也成为市里最活跃的重要官员。

张友渔同志在市政府受到崔廷献、冯司直的重视，所以遇事多与友渔同志商量。张友渔同志也就在市府的工作中和形形色色的记者接触中，了解、掌握了天津上上下下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由于消息灵通，给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位长时间从事新闻事业，善于进行斗争的“市政府”科长，也在宣传的工作中，进行了有利共产党工作的宣传。他藉“工作”之便，和一些进步记者交往，并抽暇为《大公报》写些影剧评论稿，更凭藉科长的职务兼任了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挂名的副社长；又帮助曾在北京和他一起办过《国民晚报》的中共秘密党员武竞天创办了通讯社，经过市政府的批准取得合法身份，给武竞天进行联络、传递工作极大便利。

张友渔同志在市政府内接触各方面人士，每天来访的人犹如穿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为了接谈便利，安排科办公室、科长办公室和小会客室，分别接见来客。有一天一位穿长衫的中年人径直地走进了张友渔的科长办公室，张友渔同志早已安排，在这时间内独自在办公，这人进来后，张友渔同志便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进行密谈；迨这人走时，也未远送。因为来访的人很多，类似这种情况经常有，故并无一人感到奇怪。其实，来人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客人，他就是中共中央驻顺直省委代表陈潭秋同志。潭秋同志就是在阎锡山掌握的天津市政府里布置了斗争策略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工作。又一次，一来访者走进友渔同志的办公室。友渔同志正在和别人谈话，见来人略事寒暄，便请他坐下稍候，态度颇为冷淡。等室内的人走后，友渔同志便坐在来访者身边，静等他开口。原来是中共北方局的张兆丰同志准备从天津去顺德一带搞武装暴动，需要一张通行证件。过了几天，这人又来访，友渔同志当着室内其他正在谈话的人，立即递给来访者一本书说：“你要的资料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些，你拿去看吧。”这本书里就夹着所需要的通行证件。

友渔同志就这样在天津市政府的办公室里或外出开会、参加社会活动时，完成了党的地下组织交给他许许多多的重要任务。

三、在艰苦的环境中，胜利地进行斗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彭述之曾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1928年春中央对“左”的路线有所纠正，正好可以利用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很好地组织自己的力量。1930年，“立三路线”抬头，又采取盲动主义，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准备暴动，致使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彭真、薄一波、刘仁、李子昂等同志就都是在这时被捕的。李子昂同志和张友渔同志当时都在国民党的政府机关里担任着经常出头露面的职务，很多人都认识他们，却被指派到街上去散发传单。这样的作法是很容易暴露身份，更会给党造成重大损失。但在“左”的影响下，正确的意见是不易被听取的。张友渔同志被指派到河北大经路一带散发传单，张友渔同志用坐人力车的办法，在大经路一带经过，选择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从车上向后边抛散，然后回到市政府。人力车夫快步地向前跑着，是看不到车后面的。河北大经路附近一带，比较清静，路面又比别处宽，所以没有被人发觉，友渔同志便是这样机智地完成了任务。有合法身份公安局预审科主任科员的李子昂同志被派到天祥市场去撒传单。那时公安局侦缉队已四下派人监视，李子昂同志在天祥市场楼上的一个柱角后面向楼下扔掷传单时，露出了脸面，被一个侦缉队员认出，李子昂同志便被公安局拘捕。李子昂同志坚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说自己对现实不满，参加了撒传单的活动。当时天津市公安局长是曾延毅，平日和李子昂同志常作私谈，他曾吐露过对现实不满的话，同情共产党的一些政治观点。曾延毅面对这一“案件”，便用了个“敦托”的办法，对李子昂同志“解”回山西管制，李子昂得以回到山西。

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党的机关不断地遭到破坏，天津的宪兵司令部（司令是袁庆曾）和公安局逮捕了不少的人。中共天津地下

市委书记傅茂功(即彭真)同志，中共军委系统的秘密党员薄一波，共青团员刘仁等，他们都是战斗在天津的共产主义者、中华民族的精华，不幸被捕关押在监狱，当时国民党的市政府里，呈现着兴高采烈的气氛，传说着“搜捕”的消息。张友渔同志内心充满着悲哀、痛苦和激愤，他借口工作忙，不去参与那些人的议论，自己苦苦思索着如何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如何运用市政府各方面的关系，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

中共地下组织开展营救工作的指示下达了：指示被捕的秘密党员、共青团员等进行合法的斗争。这一指示通过秘密渠道，传达给被捕的同志。

我们的同志，被捕后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承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加上有头面人物作保，有的就在公安局被释放了；公安局认为有“罪”的便转到法院。中共地下组织便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内外配合，约请律师辩护。通过“打官司”，有的同志被营救出来，有的减了刑。刘仁同志当时是共青团员，他做了不少的革命工作，刑判得很重。他就请一位姓李的律师辩护，并上诉到国民党(在南京)的司法院(相当现在最高法院)，结果刑减轻了。但是被判刑监禁的同志还不少，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志被捕后，关在河北省第三监狱(小西关“习艺所”)。由于国民党监狱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因此，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志率领“政治犯”进行过绝食斗争。

国民党对拘捕的政治犯，共产党人，“罪行”重的，投放监狱，轻的就关进另外设置的机构。在蒋介石统治的各地设有“反省院”、阎锡山在山西也设有“自新院”。中共顺直省委(原北方局)军委负责人之一廖化平(后来叛变了)当时领导张友渔同志进行秘密工作，根据上级指示，让张友渔同志进行营救工作。张友渔同志接受任务后，便向天津市长崔廷献建议成立“自新院”。把在押的三十几位同志收容起来。表面上是要他们“悔过自新”，实际上是要他们离开监狱，以便进一步营救。张友渔抓住和崔廷献谈工作的机会，建议崔廷献注意加强天津市的政治工作，对现在监狱里轻重罪

犯在一起，不易管理，更不利于对犯人做工作。他介绍了山西省的“自新院”办得挺好，争取了不少的人。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是自命模范的，友渔同志的话，打动了崔廷献的心，要向山西学习，紧步追随山西。崔廷献同意了这一建议，立刻决定在天津先成立一个“临时自新院”，并委任张友渔同志负责筹办，张友渔同志接受了这个“新委任”，并表示一定和有关同仁全力去办。

为了了解应该把哪些人安排到“临时自新院”，在监狱中到底有多少共产党员，这些人有些什么情况，张友渔便借视察“政治犯绝食”情况为理由，亲自到监狱里去了解了一下。又为避免暴露，并表示郑重其事，于是拉上了当时的公安局长曾延毅一起到监狱去视察，了解一些情况，好加强市里“治安”、“政治”工作。张友渔同志和曾延毅听了典狱长关于“犯人”情况的汇报，张友渔同志又看到了“犯人”的名册，心中已有了底。他又和曾延毅分别到各牢房去视察，还都讲了一些话。张友渔同志是到薄一波同志那一片去的，曾延毅是到彭真同志那一片。张友渔同志到了薄一波同志那片牢房时，薄一波同志代表政治犯讲了话，提了要求。话讲得很严正。张友渔同志故作官长姿态，不动声色，表现了无动于衷的样子，却已胸有成竹了。曾延毅到彭真同志那一片，彭真同志也讲了话。

张友渔同志为了不“负”崔廷献这位市长的重托，积极地进行筹备工作，选择院址，调配人员，“临时自新院”很快地就筹备就绪了。院址选在当时天津市的特二区，原来是奥租界，地处海河金汤桥下向南转东的拐角。那时这个地方车辆行人稀少，是比较僻静的地带，就是在现在进步道寿安街那里的一座小洋楼里办起了“天津市临时自新院”。把在法院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的收容起来，让他们“自新”。院长物色了一个信仰佛教的老知识分子周克昌。周克昌不赞成共产党，但也不仇视，他是想用佛教教义来改造共产党员的思想的。选用这样的人当院长，对地下党开展工作是有便利条件的。张友渔同志兼这个院的副院长，明着加强管理，实际是为了自己能直接掌握情况，便于进行营救工作。

从法院移送来的“政治犯”三十几人中，有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等几位同志；彭真同志被捕时是天津地下党市委书记，判刑重，受刑也最重，没有移送过来。

“临时自新院”和监狱自然是不能一样的，这里的生活待遇是比较好的，二人一间房子，各睡一个小铁床，每天三餐，吃的是大米白面。里面没有什么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一站岗，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外出。有一个教导员，是同情共产党的。作文书、会计、事务的职员不过三几人，都不是国民党员。

“自新”的生活是每天要学习、讨论，主要课程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周克昌讲的佛学，实际上是自由学习，并没有人检查。图书室还有书刊报纸，可以自由阅读。主要的课程三民主义和佛学，每天占得时间有限，所以这些“自新”的学员确实得到了自由，可以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事问题。他们组织了秘密的党的支部，薄一波同志任书记。

“临时自新院”成立后，张友渔同志这时考虑的问题，一是如何进一步营救这三十几位同志，并如何利用一个恰当的时机，把判刑重的彭真同志等陆续转移到这“临时自新院”来。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北方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和冯、阎在北平召开了“扩大会议”，成立了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冯、阎的军队分别在津浦、平汉两线上和蒋军开了仗。这时，东北的张学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两方面都派代表到东北与张联系（蒋方是吴铁城、张群、宋子文、阎方是贾景德、张荫梧、傅作义），结果张学良与蒋合作，并通电进兵入关。扩大会议垮台了，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通人说“退避三舍”，声明下野，然后避居到日本人当时占据的大连，把北平和天津和平移交给张学良。天津市先“发表”张伯苓先生出任市长，张伯苓“敬谢不敏”，便由臧启芳任社会局长“护理”天津市长，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任公安局长，不久又由张学铭接任了天津市长。

北平，天津虽然是和平移交，政治形势却是急剧的变化。张友

渔同志清楚地知道中共原来安排的利用蒋、阎矛盾组织的革命力量和活动，即将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他更看到自己的这个市政府科长位置也将随着这移交而丢去，利用手中“职权”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也会失掉。那营救“临时自新院”的同志们是党交给自己重大的迫切任务，应该在自己“下台”之前完成它，把三十几位同志营救出来。他苦心焦虑，决心破釜沉舟，背水借一。

天津市政府在形势恶化的气氛中，人们低沉颓丧，紧张地忙碌着，做撤走的准备，市长办公室更是格外的暗淡沉郁。张友渔同志走进市长办公室，正在沉思的崔廷献抬头注视着他，等待着友渔同志报告他一些消息或建议。张友渔同志分析了形势的发展，用激愤的口吻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输下去。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让张学良拣了便宜，把天津端过去，就连那些政治犯也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张学良捣乱。这对我们还不是很有利的吗？”崔廷献听了很中意。他对这位只三十一岁的科长，关心“地方”，工作老练，很钦佩，就进一步征询具体作法。张友渔同志建议把这“临时自新院”撤消，根本不作移交，理由是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便可撤消。崔廷献听了，欣然同意说：“让周克昌和你写个书面请示，说这些人入院后经过一段时期，表现好，刑期也快满了，可以释放，“临时自新院”随可以撤消。张友渔同志便起草了呈文，让周克昌共同签署后送到市政府，立即由崔廷献批准。这样，在奉军代表接收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摘了牌，撤了岗卫，三十几位同志立即释放。

张友渔同志很清楚，奉军进津，国民党蒋派的市党部必然立刻恢复。象刘不同那些人对共产党是决不会放过的，对这事一定还要追查，于是自己便隐避了。

四、在革命的大道上永不停止

张友渔同志在奉军入津后，便避居在法租界的六国饭店。张友

渔同志在津没有住家，是住在市政府的宿舍里。平日自奉俭约，手中略有积蓄，也就是为了“不时之需”。蒋派的国民党市党部恢复，刘不同是宣传部长，听到“临时自新院”撤消了，“政治犯”全部释放了，便扬言要缉捕张友渔同志。党组织得到了情报后，便决定让张友渔同志东渡日本。

张友渔同志接到党的指示后，便把自己的书籍找到一位干当铺行业的山西同乡寄存起来，为的是离开六国饭店不留下一些痕迹，而书籍也可“当”在当铺里，得以妥善保存。

张友渔同志是从六国饭店搭车到塘沽乘日本轮船“长城丸”号离开天津的，他告别了在这里工作过几年的天津，告别了战友，但没有写一封告别信给他在北平的战友、恋人韩幽桐同志。张友渔同志在轮船上，思潮起伏，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看到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考虑着如何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吟诵了不少的诗句，其中有这样的一首：

早起

早来无事立舱前，
极目苍茫意欲仙。
碧浪滔滔翻日外，
白云淡淡抹天边。
鸥飞掠破浪心水，
风急吹皱海面烟。
寄语人间名利客，
何须问舍与求田。

张友渔同志东渡后，从事法学研究和日本问题研究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进逼平津。由于革命的需要，张友渔同志返回了北平，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因国民党要逮捕他，又东渡日本。一九三六年又回北平，在党的北方联络局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华北救国会的工作，曾对当时冀察行政委员会宋哲元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另外与北方局直接联系的是杨秀峰同志。七七事变后，便积极组织群众准备配合军队进行抗战。当时因为宋哲元

的副参谋长张克侠是秘密共产党员，所以进行活动更有便利条件。1937年7月29日，北平的形势已紧张到极点，张克侠得到宋哲元不在北平抗战要撤退的消息后，立即通知张友渔同志，张友渔同志又立即通知杨秀峰，让他和各位同志都潜伏起来。日本侵略军进占平津，向华北进军之后，张友渔同志便和华北救国会的其他同志化了装，秘密地离开了北平，来到天津，转赴敌后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又不停步地进行新的斗争。

1988年5月完稿

附张友渔同志近作——暑期赴东北三省休假杂咏

(十二首选三)张友渔

重游镜泊湖

暑气顿然无，
重游镜泊湖。
晨兴观跃鲤，
夜卧闻啼鸟。



水平镜一面，
山绿树万株。
抚今应思夕，
烈士曾捐躯！

长春市小憩

南湖宾馆树丛中，
盛夏长春似早春。
谈心座上来旧雨(1)，
散步湖滨浴清风。



生产一汽(2)居前列，
技巧长影(3)夺天工。
为理文物史实证，
驱车一览伪皇宫。

应召返京

北京急电催，
仓卒乘机回。



访美任务重，
虽老岂容推！

注(1)：抗战初期战友于克、吴铎来访。

(2)：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3)：长春电影制片公司。

直沽话旧

李鸿章及天津李公祠

王 者 师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其先世传为江西湖口许氏，远祖许福三约于元代避乱迁安徽潜山，历三代至明宣德间再迁合肥，六传至许慎所奉父命承桃李心庄为继子，改李姓。再历七代乃鸿章父文安，榜名文珩，字玉泉，又字愚荃。35岁时中道光甲午举人，戊戌进士，用主事，签分刑部，荐升督捕司郎中，以御史记名。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转战东南，所向披靡，清廷震惊。咸丰三年，准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敕遣李文安回籍带勇协剿》疏，咸丰四年，谕李文安回籍实力防剿，卒因镇压太平军之“功”，诏以知府用。咸丰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殁于军旅，时年55岁。李鸿章自幼就读家馆，聪颖敏慧，桑梓视为良材。积年儒学甚著，更兼经世达变之术，应科举之试而入宦途。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咸丰三年(1853年)回籍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在与太平天国及东、西捻军作战中，受清廷赏识，历任府、道按察使、巡抚、总督等职。同治九年(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开始逐步扩大其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自光绪二年(1876年)，先后与英、法、日、俄等国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条约》、《马关条约》、《中俄条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谥文忠。

李鸿章做为清末的一位重臣，他的一生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所以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自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后，直至光绪二十七

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病歿，历三十载驻节津、保两地，可以说，他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几乎都与津门有关。晚年他倡办洋务，时有“南张(之洞)北李(鸿章)”之说。洋务事业对清末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影响。李鸿章创办洋务事业的基地就在天津，其在津创设的铁路、邮政、机器制造等事业，为天津的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对天津城市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鸿章1901年病歿后，清廷赐恤优加，极尽哀荣。先后在京、津、沪、宁、苏、浙、皖、冀、鲁、豫等任职之地及生地，修建10座祠堂，这在清朝的廷臣中是绝无仅有的。本文仅就李鸿章在天津的祠堂修建概况及沿革等简述如次，聊备参考。惟所阅资料有限，谬误之处殷望各方教正。

天津李鸿章祠堂是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主持修建的。袁在呈给清廷的《天津奏建专祠疏》中写道：“……伏念故督坐镇畿辅前后几三十年，以驻节天津之日为最久，津民之追维遗爱亦较他郡为尤深。……平日讲求新法，锐意富强，致富莫要于通商、崇工，致强莫急于整军、储饷，如创办招商局、电报局、电报学堂、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津京铁路以及设立海军衙门、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机器局、军械所，购铁甲战船、筑大沽炮台，是皆富强筹策之显著者。……故督驻津日久，功德在民，公请建立专祠，出自真城，未敢壅于宸听，仰愿天恩俯准予在天津建立故督之李鸿章专祠，并敕部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昭伟绩而顺輿情。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对李鸿章多方称颂，大加褒扬，所以李鸿章的祠堂是颇具规模的。堂址在今河北区鸿顺里街道办事处界内四马路口。北抵天纬路，南临子牙河沿(今李公祠大街)，西起李公祠西箭道，东至李公祠东箭道。现天津市第三十三中学即其旧址之一部。占地约2万余平方米，是一座规模宏敞，建筑华美的专祠。祠后凿池注水为湖，并辟有亭、台之胜，苍松翠柏，垂柳摇曳。在庄严肃穆之中别有一番宁静幽雅的意境，是津门此类建筑中佼佼者。

祠堂正门在今李公祠大街，朱红大门，坐北朝南，门前建有石